

太原金胜村唐墓再研究*

沈睿文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目前山西地区发现的唐墓主要集中在长治、太原、大同和侯马等地，已公布有壁画墓 11 座，其中 10 座集中见于太原西南郊晋源区的金胜村、董茹村等地^[1]，尤以金胜村为多(表 1)。太原市金胜村是目前山西地区所见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年代集中于武周时期。这批墓葬的发掘集中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已有研究聚焦于墓葬年代和墓室树下老人屏风画内容的判定^[2]，对这批墓葬的其他内涵则重视不足。本文拟对此略作讨论。

一、几点初步认识

太原金胜村唐墓屏风画的内容及题材大体相同，表现出强烈的共性。已有定谳，此不赘述。从表 1 所列情况，我们还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认识：

第一、从墓葬形制和规模来看，太原金胜村这批墓葬墓主的品级为正五品、从五品及其下。

太原金胜村这批墓葬的形制为方形或弧方形单室砖墓，墓室多在 4 平米，少数在 9 平米左右，如金胜村第三号唐墓和太原金胜村 337 号唐代壁画墓(编号 TD1988M337)。这批墓葬中，以三号墓的墓室最大。

有唐一代，弧方形或方形单室砖墓为一品至五品官员的墓制，其中一至三品官员墓室尺寸约为 4 米多见方，四、五品官员墓室尺寸就多下降至 3.5 米见方以下。方形单室土洞墓大约是五品以下品官的墓制。这类墓室尺寸多在 3.4 米见方，更多的是在 3 米见方左右；庶人墓多用不规整的斜方形土洞墓，墓室尺寸大都不超过 3 米(见方)^[3]。进而言之，高宗武周时期，正五品、从五品官员墓室多为 3 米多见方，正六品官员墓室为 2 米见方，但从九品官员墓室间或也有 3 米多见方的，庶民墓墓室则为 2~5 平方米。

山西地区墓室边长在 3-4 米之间多为五品以下的散、勋官墓。如朝散大夫(从五品下文散官)辛谦、崔孥墓的规模便是如此。几位带勋官的墓主情况也有些类似，这些人的职事官都是五品之下，是当时的下层官员，仅从随葬品无法将其与平民区分，但墓室规模似乎要稍微大一些。3 米见方及以下似多为庶人规制^[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北鸡泽县北关发现的 5 座唐墓(编号 BM1~5)^[5]可为判断太原金胜村唐墓墓主身份提供辅证。这 5 座唐墓皆为弧方形单室砖室结构，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多竖穴土坑式；甬道为砖券结构。这批墓葬不见棺槨等葬具。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时期丧葬的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批准号：13JJD780001)成果之一。

[1] 案，另有一座为山西运城万荣的薛徽墓。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唐薛徽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

[2] 赵超《“树下老人”与唐代的屏风式墓中壁画》，《文物》2003 年第 2 期，页 69-81；赵超《从太原金胜村唐墓看唐代的屏风式壁画墓》，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199-208；商彤流《太原唐墓壁画之“树下老人”》，《上海文博论丛》2006 年第 9 期，页 20-23；沈睿文《唐墓壁画中的渊明嗅菊和望云思亲》，上海博物馆主编《壁上观——山西的墓葬和寺观壁画》，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刊；等等。

[3] 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 年第 12 期，页 41-50；后收入所撰《魏晋南北朝唐宋元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页 148-159。

[4] 李雨生《山西隋唐五代墓葬析论》，《西部考古》第 6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年，页 117-118。

[5]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鸡泽县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4 年第 6 期，页 103-113。案，根据简报提供的信息，可知 BM3、BM4 以及 YM1(鸡泽县尹村唐墓)各随葬一套茶事。

河北鸡泽县北关墓群5座墓葬墓室为2.5米左右见方，发掘者认为北关墓群5座墓葬所在墓地为西周时期的郭进、郭行家族墓地。根据郭进（BM1）、郭行（BM4）墓志文所载，知郭家祖籍太原，因第十三代祖凯公任县侯，子孙因官而成为广平县（即今鸡泽县）人。郭氏家族自到广平县以来，世代为官，家族兴旺，仅曾祖郭曹之后，祖孙四代历齐、隋、唐、周四朝而不绝于仕。郭家祖籍太原，恐是该墓地葬制与葬俗呈现出跟太原金城村唐墓相同的原因。这应是郭氏家族的地域认同和族群记忆使然。郭行为云骑尉武安令，其墓葬规模与太原市金胜村者相近。

此前，根据金胜村第五号唐墓所出砖墓志所载，赵超认为该墓墓主可能只是个下级军官，而太原金胜村唐墓可能只是一些低级官员或者富裕平民的墓葬^[6]。确实，根据墓葬形制和规模来看，太原金胜村这批墓葬墓主的品级为五品、从五品及其下。

第二，从随葬品和墓室壁画内容来看，这批墓葬墓主的品级则多在三品以上。

根据《通典》卷一〇七开元礼纂类二·群官卤簿的规定：三品以下官员卤簿中有诞马，但无骆驼和犍车^[7]。该记载的可靠性也得到考古工作的证实。三品是在唐朝墓葬壁画出现骆驼图像与否的界限，三品以上允准使用骆驼壁画及骆驼俑，而三品则只能使用骆驼俑。当然，三品以上的墓葬壁画中也可不用骆驼，如减等下葬的愍王李承乾墓便是^[8]。

在金胜村唐墓中，以第三号墓墓室最大，达到9平方米之多，该墓无树下老人屏风画，随葬驼马犍车出行俑以及不包括十二生肖的神煞俑类。随葬品中有鞍马、骆驼和犍车，说明随葬品组合中有驼马/犍车出行。

金胜村第五号墓为夫妻合葬墓，墓室壁画绘有鞍马和犍车出行图。

太原金胜村第六号唐墓墓门东西两侧各绘一个执笏持剑侍卫。靠近墓的东壁有残木俑头一个，残马身一块，墙角下有铜质马饰五个。可知该墓随葬有木质的鞍马出行仪仗。一般说来，以木明器随葬的唐墓主人其品级多在三品及以上^[9]。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为夫妻合葬墓，夫妇分置在东、西二棺床上。墓室壁画绘有四神和树下老人图、牵马牵驼、执笏佩剑的侍卫2、以及侍女图2。随葬品共27件，其中釉陶牛在西侧，而三彩马、三彩骆驼在东侧。可知，牵驼图和驼马/犍车出行陶俑在该墓的共存。

如此看来，太原金胜村这批唐墓墓主的品级又多在三品以上。显然，这个结论与上文所得自相矛盾。那么，为何在这批墓葬中根据不同的元素对墓主政治身份判断迥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矛盾的现象集中于这批墓葬之中？这跟这批墓葬的墓主有何关联？他们的具体身份究竟为何？

第三，墓室顶部帐幔式新布局的出现。太原金胜村6号墓墓室覆斗形顶绘红色莲花和彩云图案，太原金胜村555号唐墓墓室顶部的南部残留部分有花及挽结的花幔，颜色有红、黄、绿三色。金胜村焦化厂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已残，星象之下用红、黄、绿三色画挽结花幔，其间以弧形连珠纹相接。这种现象也见于太原晋源镇景龙二年（708年）温神智墓，该墓穹窿顶四周亦绘挽结幔帐^[10]。

墓室顶部出现帐幔式布局，是进入唐代以后墓葬新出现的现象。为何此时墓室装饰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第四，太原金胜村唐墓都有棺床设施。除了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外，包括夫妻合葬墓在内的其他太原金胜村唐墓棺床基本上位于墓室北侧，呈东西走向。

[6] 赵超《“树下老人”与唐代的屏凤式墓中壁画》，《文物》2003年第2期，页74。

[7]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2788-2789。

[8] 沈睿文《阿史那忠墓辨正》，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页166-167。

[9] 卢亚辉《唐代木明器初步研究》，《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页97-135。

[10] 常一民、裴静蓉《太原市晋源镇果林场唐温神智墓》，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页209-213。案，温神智卒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其墓室西侧棺床上有三具人骨残骸，亦不见棺木痕迹，有残存的腿骨和一些碎骨分析，西侧两具被扰乱过，葬式不明，由墓志文可知西侧为温神智的夫人王氏、及其继室杨氏，这是开元十八年重启温神智墓室夫妻三人合祔所为。换言之，该墓建制应视为景龙二年温神智卒后下葬时所营构，而不宜待之以开元时期墓葬。

表1 山西太原金胜村唐墓情况一览表^[11]

墓葬	位置	形制	墓室	葬式	随葬品及壁画	备注
太原南郊金胜村第三号唐墓	太原南郊金胜村西南约 0.5 公里	带墓道、甬道的方形单室砖墓	东西长 3.25 米，南北宽 3.05，墓底距地表最深处为 6.5 米，墓顶坍塌。墓室北部为砖砌棺床，西壁下有一砖砌长方形小台，北接棺床，南连墓壁，长 1.7、宽 0.6 米。 墓顶坍塌	清理时墓室内人骨已被扰乱，棺床上原有人骨架两具，已腐朽，北壁下发现两个人头骨。葬具只见腐朽的棺木灰与数枚铁棺钉	随葬器物共 91 件，其分布情况是：棺床东西两壁下，依壁各立男女陶俑一排，武士俑立放在墓门东西两侧，镇墓兽放在墓室的中间，面对着墓门，其他车、马、驼、牛及生活用具等，散布在墓室的西部小台上与东壁下	[12]
太原南郊金胜村第四号唐墓	太原南郊金胜村西南约 0.5 公里	方形单室砖墓	墓室东西长 2.2，南北宽 2.13，高 2.1 米。北端砌有棺床，长 2.2，宽 1.25，高 0.23 米 墓顶塌毁	棺床上葬一人，葬式为直肢，无木棺痕迹，头向西，骨骼已朽	棺床下靠西壁处放置灰陶罐 2 件，棺床上四角各放一小陶碟（灯）。墓室顶部绘四神，四壁绘人物、树下老人图 12 幅。墓门东西两侧各绘一佩剑持笏侍卫，西壁南端、东壁南端各绘侍女图 1 幅，余 8 幅为树下老人图	[13]
太原南郊金胜村第五号唐墓	在四号墓北 10 米左右	方形单室砖墓	墓室东西长 2.07，南北宽 2.0，高 2.1 米。北端砌有棺床，西南角砌一小砖台，长 0.85，宽 0.65，高 0.15 米 墓顶为方锥形	棺床上面并排置人骨两架，东西向，直肢仰身。北边一具为男性，骨架长 1.65 米；南边一具为女性，骨架长 1.52 米，未发现棺椁痕迹	漆盘、瓷罐、陶灯、长方铁片置于西南角砖台上，圆形朱漆盘 12 件，南北排列成 3 行，行 4 件，摆于小砖台上。陶灯仿东罗马高足杯样式。砖墓志在墓室东南角，其上置 1 陶罐和男女侍俑、驼马残俑等多件，棺床上女性人架头前有陶罐、瓶和圆形漆盒（？）1 件，腰部有海兽葡萄镜 1 面，漆盒已朽，直径约 33 厘米，其内盛有：不同材质的珠饰 31 件、玉石饰件 59 件、铜饰件 4 件，以及银戒指、萨珊波斯银币和小白石钵各 1 件。在男性人架胸部及棺床西北角散置开元通宝 13 枚及五铢钱 1 枚。 墓室西壁南端绘牛车图一幅，东壁南端绘马夫，其背后绘有两匹半身的马和骆驼。自西壁中部至东壁中部皆绘树下老人图，共 8 幅。	[14]

[11] 本表仅收集有正式考古简报发表的墓葬，其他仅发表图版的墓葬则不在其列。

[1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考古》1960 年第 1 期，页 37。

[1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 年第 9 期，页 473。

[1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 年第 9 期，页 474。

					出土墓志 1 合，用两块绳纹砖制成，志文用白粉书写	
太原金胜村第六号唐墓	太原南郊金胜村西约 0.5 公里	弧方形单室砖墓	东西长 2.2、南北宽 2.18 米，墓室北边有砖砌棺床，宽 1.26，高 0.18 米	棺床上有两具人骨架，为仰身直肢，已腐朽 ^[15]	墓顶绘有红色莲花及彩云图案。 墓室壁画保存完整，计有人物和四神画共 16 幅。墓室顶部绘红色莲花及彩云图案，下绘人字形拱及四神，东西两壁顶部空隙各绘日（东）月（西）星辰，人物画 12 幅分绘于下边四壁上 ^[16] 。墓门东西两侧各绘一执笏持剑侍卫。东壁 3 幅，由南而北绘文吏、侍女和树下老人。文吏的上边有墨书榜题，有“奴兴仓，奴益多，奴多□，奴富□，奴金枝，奴三刺，奴兴钳， <u>奴</u> 有相等字。在棺床的前面，靠近墓室西壁处放置灰黑色陶罐 1 件，放置谷粒的小陶罐 5 件，棺床上有直径 6 厘米的素面小铜镜 1 件，开元通宝 6 枚。靠近墓室东壁有残木俑头 1 个，残马身 1 块，墙角下有铜质马饰 5 个	至于头向以及是否有关棺木痕迹，考古简报没有言及 ^[17]
太原金胜村 337 号唐代壁画墓（编号 TD1988M 337）	太原第一电热厂	带甬道的弧方形单室砖墓	墓室内长 2.9、宽 2.8 米，从高 1.3 米处叠涩内收。在墓室北部有砖砌长方形棺床 墓顶破坏严重	棺床上有骨架残骸，葬式不明，经鉴定为一成年男性	墓顶绘星象、四神；墓室壁面每壁各绘壁画 2 幅，共 8 幅，其中佩剑侍卫、仕女女童各 2 幅，树下老人图 4 幅。 随葬器物共 11 件，多为陶器，破损比较严重，可以辨认器形的有三彩罐 2 件、器盖 1 件；彩绘陶镇墓兽 1 件，施浅黄、褐色彩；陶奩 2 件、小兽 1 件、莲花纹瓦当 2 件；铜丝 1 段、“开元通宝”钱 1 枚	^[18]
太原金胜村 555 号唐代壁画墓（编号 TD1989M 555）	太原第一电热厂厂区东部	带墓道甬道的弧方形单室砖墓	墓室南北长 2.39、东西宽 2.35 米。覆斗形墓顶，已遭破坏。墓室北部有一砖砌棺床，长 2.39、宽 1.2、高 0.25 米	由于墓室内长期被水浸泡，死者骨架已零乱不堪，无法辨其葬式。通过初步鉴定，墓内所葬者系一成年男性和一成年女	墓室顶部的南部残留部分有花及挽结的花幔，颜色有红、黄、绿三色。推测墓顶为星象图、四神图，墓室四壁共绘壁画 10-11 幅（北壁已毁，参照南壁推测为 2-3 幅）。其中南壁 2 幅，东壁西壁各 3 幅。东、西、南三壁中惟有南壁保存最多。南壁墓门两侧各绘侍卫 1 人。墓中随葬器物共有数十件，均为绘彩釉的陶制品，由于机械施工致使北壁砖头坍入墓室，一部分器物被砸碎而无法修复。可复原者有仕女俑、女童俑、釉陶牛和三彩马各	^[19]

^[15]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 年第 8 期，页 19。

^[16] 案，简报称墓室西壁月亮里“绘人象（像）两个”，此两个人像应为吴刚和嫦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便记载有吴刚伐桂的故事。详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 年第 8 期，页 19。

^[1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 年第 8 期，页 22。

^[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 337 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 年第 12 期，页 11。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金胜村 555 号唐墓》，《文物季刊》1992 年第 1 期，页 24-26。

				性，估计是夫妇合葬	1 件	
太原化工 焦化厂唐 墓	太原化工 焦化厂	带墓道、甬 道的弧方形 砖室墓	墓室内长 2.28、宽 2.18 米，从高 1.2 米处逐层叠涩内收。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砖砌长方形棺床，长 1.77、宽约 0.85、高约 0.25 米。墓室内壁和棺床的边缘都抹有一层厚约 1 厘米的石灰泥皮，上施彩绘	在东西二棺床上，分别发现男性、女性的若干朽骨，年龄不明，估计为夫妻合葬	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已破坏。星象之下用红、黄、绿三色画出挽结的花幔，其间以弧形连珠纹相接。 墓室壁画绘有四神和树下老人图、牵马牵驼、执笏佩剑的侍卫 2、以及侍女图 2。随葬品共 27 件，其中西侧棺床上放陶罐 3 件，三彩鸡、鸭各 1 件，铜钱 2 枚，棺床前墓底放三彩女俑 3 件，釉陶牛 1 件；东侧棺床前器物较多，有三彩男俑 3 件，三彩马、三彩骆驼、陶猪、釉陶羊各 1 件，陶罐 3 件，还有陶仓、陶碓、陶灶、陶瓶形器、陶异形器等生活用具或明器。 墓志 1 合，用两块青灰色方砖制成	[20]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2 期，页 53。

在墓室中如此规划棺床在当地北朝墓葬中也可见。现有研究表明，唐墓墓型结构有无棺床设施应代表当时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墓葬等级或规制，至于随葬品种类及数量多寡，除与各墓保存状况有关外，可能与墓主身份地位及贫富状况也不无关系^[21]。

值得注意的是，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为双棺床东西并置于墓室。在墓室东西两壁下砌筑并列的双棺床，在已知唐墓中也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做法。从刊布的资料来看，这种建制另见于前述河北鸡泽北关 BM5^[22]和洛阳龙门的安善墓^[23]等两座唐墓^[24]。

河北鸡泽北关 BM5 为郭家墓地成员，郭家迁自太原。这很可能表明墓室双棺东西并置的建制与太原地区存在着某种关联。

安善墓墓主为信奉祆教的粟特裔，该墓为景龙三年十月廿六日（709年12月1日）安善夫妇洛州合葬时所建，采用双棺床东西并置，不知是否寓示着这种建制跟墓主的胡裔文化属性有关？

第五，太原金胜村唐墓，除了金胜村第三号唐墓发现有腐朽的棺木灰与数枚铁棺钉之外，余者皆不见葬具，只有骨骸。即，径将尸体安放在尸床上，不用棺木收殓，为无棺葬。

在长治、太原、大同和侯马等地发现的唐墓，虽位于同一大区中，但是这几个地方的葬具使用情况却不尽相同。太原地区唐墓多未发现葬具痕迹，人骨架散置于棺床之上；而山西其他地区唐墓则使用木棺为葬具，且多置于棺床之上^[25]。

在北朝的各个时期，在多个政治中心区域包括太原地区在内，都发现有无棺葬现象，如1987年8月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太原第一电热厂发现的北齐壁画墓^[26]等，但这种葬俗显然并非太原地区固有，亦非汉文化传统葬制^[27]，此毋庸置疑。不过，入唐以后，山西地区的无棺葬葬俗却集中于太原地区，显得比较特殊，这表明太原金胜村这批墓主的宗教信仰或丧葬观念跟山西其他地区不同。那么这批墓主人秉持的是何种文化？他们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出现的？

前已述及，河北鸡泽县北关唐墓保留了其祖籍地太原地区的葬俗，该墓地有两座墓葬墓主清楚。其中郭进（BM1）墓室北侧并列人骨三具，扰乱较甚，可能系冲刷或盗扰所致。从残迹可知均为仰身直肢，头向西，一男二女，男性居中，其中北侧一具人骨最为零乱，可能系迁葬。墓志载万岁登封元年（696）郭进歿后与夫人张氏、继室高氏合葬。同样地，根据墓志所载，BM4为如意元年（692）郭行歿后与夫人焦氏的合葬墓。BM5夫妇则分置东、西两侧棺床，该墓未见葬具痕迹，男性头骨及女性尸骨似经人为扰动，整体移位。这表明该墓为迁葬墓。

综上，或可推断河北鸡泽县北关的五座唐墓出现无棺葬的形式跟迁葬合祔有关。那么，太原金胜村唐墓的无棺葬现象是否也是由此造成的？

二、入唐粟特裔祆教徒墓葬

上述太原金胜村唐墓无棺葬的习俗，在隋唐时期还见于宁夏盐池窰子梁墓地。

窰子梁墓地六座唐墓皆为依山开凿的平底墓道石室墓，皆为石棺床，被盗严重。这六座墓的墓葬形制、墓室结构基本一致，它们排列有序（图1），显然是同一族属的墓葬^[28]。

[21]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鸡泽县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4年第6期，页112。

[22]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鸡泽县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4年第6期，页104。

[2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善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页21-26、14，图版三-九；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门唐安善夫妇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24] 案，在西北大学校区也发现一座双棺东西并置的初唐墓葬，两个骨架分置其上，发现有木棺痕迹。2016年7月22日，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告知，于此谨致谢忱。

[25] 华阳《浅议山西唐墓的葬俗》，《湘潮》2011年第12期，页18。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页1-10。

[27] 刘振东《论北朝时期无棺葬》，《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5期，页84-94。

[28]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页43-56。

宁夏盐池窰子梁墓地 M3 (图 2、3、4) 所出墓志载,“大周……都尉何府君墓志之铭并序”、“君□□□□□大夏月氏人也。……粤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鲁县□□里私第,君春秋八十有五。以其月廿八日,迁窆于□城东石窟原,礼也”^[29]。可知该墓墓主何府君为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人后裔^[30],即粟特裔。换言之,窰子梁墓地为粟特何国人后裔的家族墓地。这六座墓中有单人葬、双人葬,还有多人聚葬于一室的现象,其中 M4 葬尸骨四具, M5 尸骨多达十余具,应是一种聚族而葬的现象。在葬俗方面,6 座墓中有的石棺床上有使用木棺的痕迹。M1 墓室北部石棺床上置一梯形木棺,棺内有人骨一具,已基本腐蚀成粉状。M2 墓室北部石棺床上有腐朽的棺木和尸骨痕迹。除此之外,其余各墓均未发现葬具。其中 M4、M5、M6 内的尸骨直接陈放在石棺床上或壁龛内, M6 后龛头西脚东并置二尸骨。

窰子梁墓地地处唐代六胡州之一的鲁州辖境,墓地的实际环境及“石窟原”的地名表明该粟特裔有意选择岩穴式的石制坟墓为其最后归宿,这除了避免天葬后的遗骸与兽类接触、不沾污雨不带水^[31]之外,恐还与沿袭了古代伊朗王族和贵族的丧葬传统^[32]有关。正如玛丽·博伊斯指出的那样,从居鲁士开始,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后的安息、萨珊王朝,国王以下的显贵所筑石室主要是为曝尸之后的瘦骨之用^[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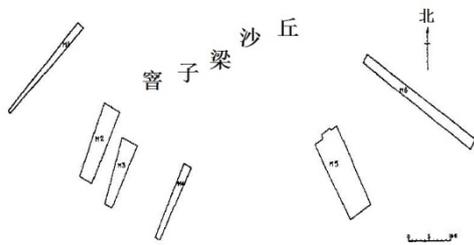


图 1 盐池窰子梁墓地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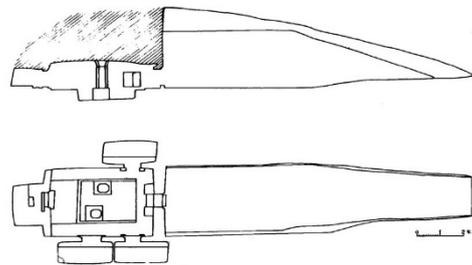


图 2 盐池窰子梁 M3 平剖面图



图 3 盐池县窰子梁 M3 墓门



图 4 盐池县窰子梁 M3 墓室

事实上,关于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葬俗,内部也有不同。即使同为琐罗亚斯德教徒,王族和祭司、普通教徒的葬俗在具体做法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就考古资料显示,波斯帝国的君主虽然大都笃信琐罗亚斯德教,但他们并非全部实行天葬,即使在该教普遍流行的萨珊时期,情况也不见改变。这倒并非只是由于“传统习惯的改变,要比宗教信仰的改变困难得多”^[34]。阿契美尼朝的君主们遵循着古代伊朗王族和贵族的传统,把尸体涂香防腐,安放在石制坟墓里,这种做法表现了其“渴望升入天堂,来日再生的愿望,这是贵族等级特有的权利”^[35]。开国君主居鲁士一世(Cyrus I)就没有根

[29] 《何府君墓志》,《全唐文补遗》第 6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 年,页 349。

[30] 罗丰《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之胡旋舞——以新获宁夏盐池唐墓石门胡舞图为中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 年第 2 期,页 50;后收入所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页 280。

[31]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页 8。

[32] 案,对该传统的梳理,详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页 162-163。

[33] M.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and New York, 1979, pp.59-60.

[34] 林悟殊《中古琐罗亚斯德教葬俗及其在中亚的遗痕》,所撰《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年,页 87。

[35] Mary Boyce,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vol. I, Leiden/köln: Brill, 1975, p.325.

据正统的仪式曝尸，表面看来似乎违背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然而他的陵墓经过仔细营造，使熏香的尸体与活着的生物之间不会发生联系，从而遵守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36]。实际上，不仅阿契美尼人，而且继起的帕提亚人（Arsacids，即安息人）和萨珊人（Sasanians）也坚持固有传统，他们把国王的尸体涂香，放在石制坟墓里^[37]。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在琐罗亚斯德教流行的时代，王族在不违背教义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尊贵的地位，可以不曝弃尸体。通过上述的粗略分析，可以肯定“弃尸于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独特葬俗，而且主要为祭司和下层百姓所遵循^[38]。

在阿塞拜疆迄今还有一处阿特拉帕达时代的祆教古迹，此即法赫里卡（Fakhrika）的岩墓，其地在乌鲁米亚湖东南，该处有座小山，岩墓高出平地五米许，有前室和墓室，墓室内有四个石龕，其长度不足以安放一个成人尸体，估计应当是置放骨壶（即纳骨器）之处，是死者裸葬（即裸尸天葬）以后取其骨骼予以安置，这是祆教葬仪习惯。史称阿塞拜疆是小米底，而与之相对的还有一大米底，则指包括哈马丹、赖加等城市在内的地区，该地也发现有许多属塞琉古王朝时代的岩墓，计有：吉斯卡本岩墓（Ishkewt-i, Qizqapan，在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库尔刻赤岩墓（Ishkewt-i Kuru-u-Kich，在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达乌德岩墓（Dukkan-I Daud，在呼罗珊大道的扎格罗斯山脉的隘路处）；拉文萨岩墓（Ravansar，在起尔漫沙西北）；沙赫那岩墓（Sakhna，在起尔漫沙与哈马丹之间）；贝希斯顿（Behistun）以南一组岩墓。这些岩墓的构筑样式并不一致，但其共同的功能是为死者的骸骨提供一个安全置放场所，使其不受玷污^[39]。其原因便是祆教教义要求入葬必须与泥土隔绝。《闻迪达德》第3章第35-39节规定，如有人把狗或人的尸体埋于地里，半年不挖出者，罚抽一千鞭，一年不挖出者，抽二千鞭；二年不挖出者，其罪过无可补偿^[40]。

可见，甯子梁墓地无棺葬于崖墓的方式为一种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传统的丧葬形式，为入唐粟特裔祆教徒所承继。



图5 固原九龙山 M33 平剖面图及下颌托的出土情况与线图

另一个与祆教相关联的无棺葬墓例为固原九龙山 M33。该墓位于九龙山汉唐墓葬区南侧，为单室土洞墓，西南向东北，呈“丁”字形结构，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及墓室组成。斜坡式墓道位于墓室北端，拱顶甬道北接墓道，有残存的土坯封门。墓室平面呈不规则梯形，平底，四壁略向上内收，顶部已坍塌，可能原为穹窿顶。该墓为夫妻合葬墓，没有发现葬具，两具人骨头东足西，分别安置在墓室南北两侧，北侧为男性，年龄约在 35-40 岁之间，南侧为女性，年龄约 25-35 岁。该墓随葬品金币、金饰及少量陶器等。北侧墓主头戴金冠饰，下颚处有金颌托（图5），左侧骨盆上下有一金带扣和一金带饰，南侧墓主夫人头部有一穿孔东罗马金币^[41]，墓室东壁偏南有一残陶罐、一残陶

^[36]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p.52; Mary Boyce,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vol. II, pp.54-57.

^[37]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p.121.

^[38] 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163 页。

^[39]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页 136-137。

^[40]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页 88。

^[4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 年第 10 期，页 60-65。案，该东罗马金币的位置，在《简报》（页 61）中认为是北侧墓主人口含。《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则作“南侧人骨头部”。从该金币有

盆。

该墓虽没有出土带有明确纪年的器物，但根据出土遗物及墓葬形制，可将墓葬年代定在隋末唐初^[42]。墓主夫妇两具人骨的头骨皆有鼻骨隆起明显、鼻棘发达、面部水平方向突出和矢向突度弱等特征，属于西方欧罗巴人种。墓主所戴金冠饰为模仿自隋虞弘墓石椁壁第五幅中的那种帐幕，意在表达墓主灵魂升入中界的祝愿，而顶部日月饰两侧的对鹅表示墓主为祖尔万教派的信徒^[43]。九龙山 M33 墓道口朝北便跟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对北方方位的看法，特别是教徒死尸头部不能朝北的习俗有关^[44]。因另文已具，此不赘述。

该墓墓主夫人使用东罗马金币为胸前挂饰。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贵族并没有接受贴身随葬外国金银币的习俗，这种葬俗与入华粟特人有关^[45]。在两京地区墓葬中出土的萨珊银币很显然是作为一种珍宝而随葬的，并且这些银币中有很多被穿孔，原本就是佩戴之饰物，这也是见于河中地区粟特人的生活习俗。它经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九龙山 M33 墓主夫人很可能为粟特裔^[46]。

从公元 4 世纪初到公元 8 世纪上半叶，在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建立起了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的网络是由粟特人建立的。北朝隋唐时期，来华的波斯人主要是肩负外交和政治使命的使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很难插足粟特人所建立的高贸网络，来争夺中亚和中国本土的商业利益了^[47]。亦即，当时奔波于东西方之间的商团，其核心人物是粟特人^[48]。如此，若再从唐代前期粟特内婚的习俗^[49]来看，则九龙山 M33 墓主应为粟特裔^[50]。

另一采用无棺葬的墓地为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莹院，这是沟西墓地最大的莹院墓地之一。莹院坐西向东，长方形，东部有长方形门道，康氏家族莹院内有 33 座墓葬，其中 30 座为斜坡道洞室墓，另 3 座为竖穴偏室墓。墓的方向与莹院方向一致，墓冢南北成行，东西成排，排列有序，这批墓葬的年代为魏氏高昌国晚期至唐西州早期。康氏家族是当年交河故城内的一个大家族。从墓志志文分析，康氏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官宦家族，为粟特地区昭武九姓中康国人的后裔，而且已入籍汉化，成为高昌国及唐西州属民。竖穴偏室墓为当地春秋战国到车师国时期的车师人墓葬形制，康氏莹院内有 3 座墓葬采用该墓制，而随葬品的时代和康氏墓地一致。所以这支康姓家族和车师人后裔联姻通婚。康氏家族莹院内的墓葬皆采用无棺葬于棺床上的方式，另可见骨灰罐附葬于墓葬中的现象，此应是粟特人固有丧葬习俗的遗留^[51]。沟西墓地康氏家族莹院的种族与无棺葬的方式，是无棺葬与粟特裔相关的直接证据。

睿子梁和固原九龙山 M33 以及交河故城沟西康氏家族莹院的墓例都证明，无棺葬的葬俗跟中古中国粟特裔及其袄教徒有关。显然，这有助于太原金胜村唐墓墓主种族与文化的判断。

但是，无棺葬并非入唐粟特裔袄教徒的唯一埋葬形式，如固原南郊史氏家族便采用李唐政府单

穿孔来看，后者应是。详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年，页 127。

[4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页 131。

[43] 陈婧修《固原九龙山 M33 出土下颌托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学位论文，2016 年 6 月。

[44] 沈睿文《重读安菩墓》，《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4 期，页 34-39。

[45]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页 76-78。

[46] 案，同样的，固原南塬 M15 墓主为 15~18 岁的女性，其骨架中部出一穿孔的波斯萨珊银币，同样地，可以判断墓主为粟特裔。详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塬汉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页 57-58。

[47] 荣新江《丝路钱币与粟特商人》，原载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页 1-7；此据所撰《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页 241。详细的论证，请参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原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辑，页 56-76；后收入所撰《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页 61-80。

[48] 罗丰《丝绸之路与北朝隋唐原州古墓》，《固原师专学报》1998 年第 5 期，页 84。

[49] 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 年第 9 期，页 841-848；程越《从石刻石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 年第 1 期，页 24；刘慧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华夏考古》2003 年第 4 期，页 55-61；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页 134。

[50] 案，固原九龙山 M4 未见葬具，墓主为一 35~45 岁的成年女性，该墓发现一穿孔的东罗马金币（《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页 114），可知墓主很可能为粟特裔。

[51]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考古》2006 年第 12 期，页 12-26。

室砖墓的埋葬方式（图6）。固原南郊史氏家族墓墓主是来自中亚史国的粟特裔，墓志称其是入仕北朝而落户于原州的。在6座史氏家族成员墓葬中，以史诃耽官品最高，官至三品；其次为史射勿与史索岩，为四品；史道洛、史铁棒、史道德则为五至六品^[52]。事实表明，使用唐朝墓制的史家仍信奉祆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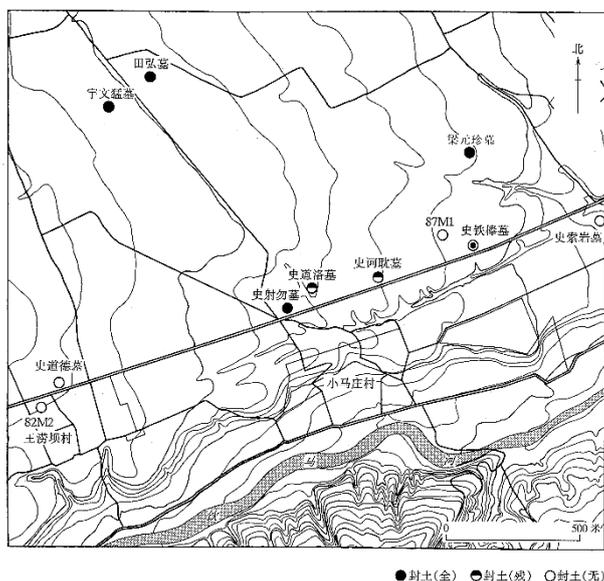


图6 固原史氏家族墓地

固原南郊史氏家族墓地发掘的六座墓葬中，有五座墓葬出土了仿制金币，其中葬于隋大业六年（610）的史射勿墓为萨珊银币^[53]、葬于唐乾封元年（666）的史铁棒为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仿制品，而唐显庆三年（658）夫妻合葬的史道洛（永徽六年薨，655）、葬于显庆三年（658）的史索岩、葬于咸亨元年（690）的史诃耽以及葬于仪凤三年（678）的史道德墓则分别随葬东罗马金币仿制品^[54]。这五枚仿制金属币都有穿孔，为墓主身前挂饰。将银币、金币穿孔作为项饰挂于胸前，是源自中亚的风俗。可见，固原史氏仍保留着粟特本土的生活习俗。

不仅如此，固原史诃耽墓出土蓝宝石戒面印章上的文字是三次重复的词，意思是“虔诚、敬神、可嘉、尽责的。”印章上狮子和植物纹样可能和墓主对阿娜希塔女神和阿什(Ashi)女神有关。文字和图案很可能与史诃耽本人的祆教信仰以及负责掌管初唐马政、参加玄武门事变经历有关，反映了他对特别保佑马群繁盛的阿什女神的崇拜^[55]。史道德墓出土的鎏金铜覆面（1组11件）配件包括一套金下颌托，冠饰部分出现与九龙山M33下颌托类似的日月形图案，亦可为史道德信奉祆教的辅证。1963年，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件鹿纹十二瓣银碗，其口沿下篆刻的一行粟特文铭文，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释读为“祖尔万神的奴仆”。林梅村认为作器者一定是位祆教祖尔万教派的粟特教徒^[56]。史氏家族成员史射勿名射勿，字槃陀，粟特文中“射勿槃陀”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则这也说明固原史射勿家族很可能信奉祖尔万教派。从史索言、史道德分葬于史射勿家族墓地两侧来看，史索言家族同样信奉祖尔万教派。史诃耽曾祖史尼为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

[52]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页143。

[5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页15-22；同作者《宁夏固原出土波斯银币、拜占廷金币》，《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页7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页16。

[54] 史铁棒、史索岩、史诃耽以及史道德墓金属币，详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页82、37、59-61、92。史道洛墓金属币，详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136-138。

[55] 郭物《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页96-101。

[56] 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原载《文物》1997年第9期；此据所撰《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页158-159。

史思为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史射勿为隋左领军、骠骑将军^[57]，后史家又掌握唐代原州地区马政，可谓北朝隋唐原州粟特种落之政教首脑，其所辖及下属应也信仰同一教派为最大可能。可见，中古时期原州存在祖尔万神的信仰。

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祖尔万教派是中古中国粟特裔信奉的一个主要教派。祖尔万教派曾在中亚传播，在印度河上有丝路古道摩崖也见有粟特文祖尔万神的名字 Zrwm^[58]。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粟特胡名字中也多有与“槃陀”同音的。结合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的篆刻粟特文铭文“祖尔万神的奴仆”的粟特银碗以及前述固原史氏家族，这些地点基本上分布在从中亚到丝绸之路主干和东路北段上，可以架构起一条祖尔万教派东传中古中国的路线。所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释迦降伏外道像》造像碑中，才以骑双鹅的祖尔万神替代中古中国的祆教，表现外道^[59]，此是祆教信仰为中古中国粟特裔的主要信仰使然。上述西安沙坡村发现的粟特银碗，很可能便是反映唐时京城长安祆教徒信仰的主要倾向。也许信奉祆教中的异端祖尔万教派，是这批信徒东迁中古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见，使用单室砖墓下葬的固原史氏其宗教信仰为祆教，而且很可能是祖尔万教派教徒。那么，他们使用这种埋葬方式是否与其宗教信仰相悖？

实际上，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信徒可使用墓葬的形式。葛乐耐（Frantz Grenet）曾指出与古代伊朗宗教密切相关的葬俗的相关程式：

人死后“去除尸肉的仪式”分为三段时间进行。在该过程的第一段时间内——这只是在天气恶劣或时辰过晚而不能在人亡后立即将尸体运往尸肉处理场的情况下所做的规定——可以把尸体放在屋内挖成的坑穴中，或暂厝于专为这种用途而建造的室内。在第二阶段内，尸体被运到应暴露给食肉禽兽的地点。总的原则是，尸体被放置到尽可能高处，以确保有狗和噬腐肉的猛禽的光顾。……尸敛的最后阶段为处理去除肌肉之后的骨骸。当时有两种并行不悖的做法：一是骨骸留置原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尸肉已去，引起病疫的危险已被消除；二是加以收敛，安置到一个封闭的构筑物中，或放到一个叫做“骨瓮”的器皿之内。^[60]

而如果没有条件提供安息塔，可把尸体置于地上，放在毛毯和枕头上，让死者披着天宇的光芒，目朝太阳（*Vendīdād Fargard V*）^[61]。据信，太阳之光成为亡者灵魂飞升天宇的途径。

巴托尔德认为火祆教葬礼分三个阶段进行：一、人死后，将尸体暂时搁在专门的地点——喀塌（kata）；二、将尸体搬进“寂静之塔”（Dakhma），安放在“曝尸台”上，以便让狗和鸟吃肉体；三、从“寂静塔楼”取出尸骨，将其洗干净后，放入地表墓室——纳吾斯（naus）里^[62]。

可见，祆教信徒的骨骸除了放到骨瓮（纳骨器）之内，尚可安置到一个封闭的构筑物中。此“构筑物”在中亚便是一种名叫“纳吾斯”（Naus）的建筑，实与墓葬同。当然，前述波斯崖墓也可视作纳吾斯。

在片治肯特的沙赫里斯坦（Shahristan）以南有许多小丘，约 15 个左右，小丘之下有坟墓，属 6-8 世纪，墓呈方形或长方形，就像一个小屋，内部面积多数是 4、5 平方米，壁厚约一米，入口处原有木门，后被毁，三面墓壁筑有长凳状安放骨壶（即纳骨器），较大的墓约有十个骨壶，无疑这些骨

^[57]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页 69、82。

^[58] 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 158-159。

^[59] 荣新江《〈释迦降伏外道像〉中的祆神密斯拉和祖尔万》，所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 326-342。

^[60] Frantz Grenet, *Les pratiques funéraires dans l'Asie centrale sédentaire de la conquête grecque à l'islamisation*, Paris: CNRS, 1984, pp.34-37; Frantz Grenet, *Les pratiques funéraires dans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Grand atlas de l'archéologie, 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985, pp.236-237. 转引自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所撰《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页 241。

^[61] *The Zend-Avesta*, Part 1, in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IV, Translated by James Darmesteter,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7, pp.73-74.

^[62] V. V. Bartold, "Istorija kulturnoj žizni Turkestana", *Akademik V. V. Bartold Sočinenija*, T. II, čast 1, Moskva, 1963, p.212; 转引自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页 264。

壶都属于某一家族^[63]（图 7、8）。

阿克·贝西姆 3 号发掘点是祆教徒墓葬，大陶罐里装进死者去掉肉的尸骨，将灵器放进建立在地面上的墓室 *naus* 里，墓室是夯筑的或用砖坯砌成的^[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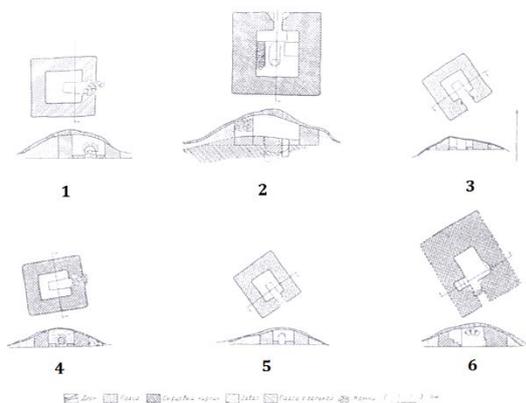


图 7 1948 年发掘片治肯特 1-6 号纳吾斯平剖面图

图 8 片治肯特 17-19 号纳吾斯（由南而北）

这种情况跟《通典》所载有似。《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蕃记》载康国：

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槨。^[65]

狗食尸肉，不见于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葬仪，应是琐罗亚斯德教进入中亚地区受到当地葬俗影响（即内亚化）所致。

从前引宁夏盐池窖子梁墓地 M3 所出墓志知，粟特裔何府君“歿”后仅 11 天便迁窆，则此处的“迁窆”应可说明在此举之前有天葬的行为。

又如，康欵，“以显庆元年二月十八日先天而逝，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曹氏，……以永隆二年六月一日终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五。还以其年八月六日改祔于邙山”^[66]。“改祔”二字似可说明曹氏歿后起初并不葬于北邙夫君康欵墓穴，而其歿时距改祔康欵墓穴仅两个月零五天。这种状况很可能说明曹氏歿后首先是采用了天葬的形式处理尸骸。

《龙润墓志》载，永徽四年九月十日，龙润薨于安仁坊之第后，“潜灵殡室，待吉邀时。永徽六年二月廿日，附身附槨，必诚必信，送终礼备，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州城北廿里并谷村东义井村北”^[67]。中土虽有将尸体暂厝的习俗，但龙润身为萨宝府长史，自当崇信祆教。由此种族文化视之，所谓“潜灵殡室”很可能便是为龙润举行天葬葬仪之后，再收其骨殖暂厝一处、择时合葬（二次葬）。于此，亦可知入唐祆教徒暂厝天葬所剩骨殖之处亦可称作“殡室”。

[63] 龚方镇、晏可佳《祆教史》，页 158-159。案，本文图 7、图 8，分别出自 B. Ja. Staviskij, O. G. Bolšakov, E. A. Mončadskaja, “Pjandzidentskij Nekropol”, *Tadzikskaia Arheologičeskaja Ekspediciia, Materily I issledovanija po Arheologii SSSR* 37, Moskva-Leningrad, 1953, C.66, C.71。

[64] 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页 262-264。

[65] 《通典》，页 5256。案，跟该问题相关的还有关于太原地区“黄坑”为佛教尸陀林的辨正。详见蔡鸿生《唐代“黄坑”辨》，原载《欧亚学刊》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页 244-250；此据所撰《中外交流史事考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年，页 60-67。崔岩《也谈唐代太原“黄坑”葬俗的宗教属性》，《洛阳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页 22-24。

[66] 《康欵墓志》，《全唐文补遗》第 3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页 452-453。

[67] 《全唐文补遗》第 5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页 111。

2007年4月，山西汾阳市胜利西街发掘了一座唐永徽六年（655）曹怡墓。曹怡墓为弧方形单室砖墓，墓道未作清理，墓室为3米见方，未发现墓主人骨骼。残存器物15件，散置于墓室四壁之下。其中高领陶罐3件，青瓷梅瓶1件，青瓷龙柄鸡首壶1件，陶俑9件以及墓志一合。陶俑有官帽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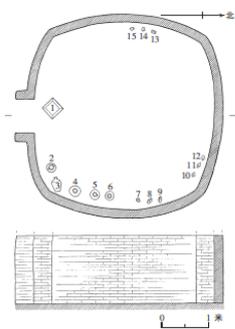


图9 曹怡墓平剖面图

武士俑及男女侍俑。简报推测为火葬墓^[68]。曹怡为入唐粟特裔，其父曹遵为唐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都尉（从五品勋官），则曹遵应信奉祆教，如此同为骑都尉的曹怡应也信奉祆教^[69]。从简报提供的信息来看，该墓此前并未遭受盗掘，墓室中也没有发现骨灰存放的迹象，而尸骸或骨灰置于墓道的可能性应无。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该墓之所以没能发现曹怡骨骼，其原因只能是信奉祆教的曹怡在他处举行了天葬的仪式，骨骼全无，因此在墓室中未能收敛其骨骼。而天葬后骨骼全无的曹怡后人之所以仍为他修建了墓葬，则意在展现曹怡所应享受的政治待遇而已。

固原南塬 M30 为一平面呈刀字形的单室土洞墓，墓室内未见人骨及葬具遗迹，只有两具完整的山羊骨架，一具位于墓室中部，另一具位于墓室西南侧，从墓室内羊骨架的位置来看，它们占据了墓室大部分空间，墓内葬人或迁窆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墓室内未发现其他随葬品^[70]。固原南塬 M39 墓室形制与固原南塬 M30 相同，墓室内同样未发现人骨架及棺木痕迹，仅在墓室东壁中部发现一卵石和一枚猪犬齿^[71]。固原南塬隋唐墓地与固原南郊史氏墓地接壤，结合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在陆路丝绸之路的优势地位，颇疑这两座墓葬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与上述曹怡墓同。

由曹怡墓葬的状况，我们多少也能理解缘何北周安伽等粟特裔墓葬唯有墓主尸骸，而缺失墓主夫人尸骸，尽管在墓葬的丧葬图像中也着意表现了墓主夫妇二人的元素。

因此，盐池窰子梁墓地应是天葬后的骨殖藏纳处。该墓地与固原九龙山 M33 都为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的埋葬形式^[72]。而固原史氏家族墓地，在对所辖唐王朝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亦不悖其种族文化。太原金胜村唐墓的埋葬形式则介于二者之间，因此可初步把金胜村唐墓推定为入唐粟特裔墓葬。这些中古中国粟特裔采用的埋葬形式与其原本之种族文化并不悖。

三、共性：家族墓地

上述太原晋源区金胜村唐墓相距很近，其中太原南郊金胜村第三号、四号、五号以及六号唐墓等四座集中于金胜村西南约0.5公里处。这表明这些墓葬相对集中，遗憾的是，几次简报并没有提供一张整个墓地的平面布局图。

太原金胜村唐墓在葬俗上表现出极大的文化共性，并非简单地用“地方性特点”便可解释清楚，更可能是同一家族墓地的反映。太原金胜村这批唐墓大多没有墓志，所幸其中第五号墓出土一合墓

[6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博物馆《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页28-32。

[69] 案，根据《元和姓纂》“安姓”下“姑臧凉州”条所记“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荣新江认为萨宝是一种世袭担任的官职（详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袄祠的社会功能》，原载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此据所撰《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页258）。曹遵父子任职的情况跟龙润父子的情形相同，这种现象或可说明萨宝府官职也具有一定的世袭性。

[7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塬汉唐墓地》，页77-78。

[7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塬汉唐墓地》，页98-99。

[72] 案，固原九龙山 M33 北侧墓主左手指骨与南侧墓主夫人右手指骨相扣（《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页127），但不能据此就判断墓主夫妇歿后即同时下葬于该墓葬中。如，固原南塬隋唐墓葬 M3 亦为夫妻合葬墓，墓主夫人骨架呈仰身直肢状，面南稍右倾；墓主骨架则面北左倾，呈侧身直肢状，右臂、右腿搭在前者骨架上。两具骨架呈相拥搂抱状。但是，在墓主脑颅骨右上方发现一穿孔，从颅内清理出铁镞一枚，表明墓主可能死于箭伤（《固原南塬汉唐墓地》，页30）。据此，应可推断墓主因伤先歿，而待其妻死后，后人人为地将二者摆置称相拥搂抱状使然。因此，并不能遽断固原九龙山 M33 墓主夫妇二人同时下葬。

志给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该墓志用两块单面绳纹方砖做成，志盖磨成盃顶，用白粉篆写四字，篆法不规正，志盖四坡以白粉绘卷草纹。志盖纵宽 33.4，横宽 34.5，厚 6.7 厘米。砖志面上浅刻成方格子，志文亦用白粉书写，多已模糊不清，或已全湮灭。共 11 行，行 11 字，直书左行。砖志文曰：

君讳祖字仁^乐平郡^人也
缘家之里道至
启^运之^期投^节从^戎
(指)麾万里机改^殉
故^敏德^足将^精
之^宝并详诸史可言
曾祖杨公祖史父
任京师司户学穷义理文
词宗^显足驰驰嗣方奄
铭曰寔寔路杳杳
万勒此铭^[73]

可知，该墓主为乐平郡人（今山西昔阳县境内），其父任京州司户，京州为京都或陪都所在地，后改称府。墓主父亲曾任京州司户，即在太原担任司户。狄仁杰为并州人氏，亦曾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这可能也是金胜村第五号墓中出现狄公望云思亲屏风的原因，盖以此图像自勉。这是一幅地域性特点浓厚的图像。由此亦可反衬出太原金胜村唐墓的文化渊源相同，其墓葬形制、规模、建制大同，很可能为家族墓地。

金胜村第五号唐墓墓主夫人头骨前漆盒内的珠饰、饰件共同构成女性项饰。漆盒中的萨珊波斯银币，不清是否穿孔作为佩戴之饰物，但从隋唐时期贴身随葬外国金银币的葬俗与入华粟特人有关来看，金胜村第五号唐墓墓主夫人很可能为粟特裔，而从唐代前期粟特裔内婚的特点来看，则该墓墓主亦为粟特裔。

在墓志文的书写方式上，金胜村第五号唐墓跟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在墓志文体现出某种共性。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志 1 合（标本 27）用两块青灰色方砖制成，平面正方形，志盖盃顶，墓志砖背面饰绳纹。边长 44、通高 15 厘米。墓志置于墓道接近甬道封门砖处，周围堆放河卵石。据施工时目击者称原有朱书文字，但清理时已受到破坏，字迹全无^[74]。而这种书写的共性恰恰亦多见于中古中国粟特裔墓葬中。

同为武周时期的粟特裔处士康文通墓的天王俑描金处还用朱砂勾勒出纹饰，且随葬的马、骆驼俑，鼻、嘴部也残留朱砂痕迹^[75]。

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茔院内的 M4、M5、M6、M11、M20 各出砖墓志一方，除了 M11 志文为墨书之外，其余四方皆以朱砂题写志文^[76]。

根据墓葬建制、石棺床以及随葬品等方面综合分析，若与康业等粟特裔墓葬进行比较，则可知天水石马坪石棺床墓主人的种族文化应与康业、安伽等粟特裔同^[77]，很可能也担任萨宝之类的官职^[78]。该墓随葬的墓志以朱砂书写，清理墓葬时志文已不清。

北周史君墓石堂门楣石上有汉文、粟特文双语题铭，其中的汉文题铭便是以朱砂写就的^[79]。此

[7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页475-476。

[7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页53。

[7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康文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页30。

[76]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考古》2006年第12期，页21-23。

[77] 姜伯勤《隋天水“洒如绳”祓祭画像石图像研究》，原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页13-21；此据所撰《中国祓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页155-172。

[78] 沈睿文《重读安菩墓》，《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页34-39。

[7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期，页39-4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外，史君石堂内顶部仿木的建筑结构同样也是使用朱砂绘画。

上述情况或说明境内粟特裔在丧葬中对朱砂情有独钟。如果考虑中古中国粟特裔使用朱砂的丧葬行为，那么山西汾阳曹怡墓红砂岩质地墓志石的选择恐也有颜色方面的考虑^[80]。

2015年，西安长安区发掘出土了一座北朝时期吐谷浑暉华公主库罗伏和柔然骠骑大将军乞伏孝达的合葬墓，该墓出土了两合石墓志，其中暉华公主墓志用楷书刻制而成，而柔然骠骑大将军乞伏孝达墓志用朱砂书写，文字脱落严重，已无法辨识^[81]。

不知石灰、朱砂书写墓志是否是内亚丧葬传统？显然，这种特性又再次将金胜村唐墓墓主指向入唐粟特裔。换言之，太原金胜村唐墓很可能为某粟特裔的家族墓地。

四、忠孝屏风画的选择

初唐墓葬屏风画分布的地域性，基本上可分作长安地区和太原地区。前者为仕女屏风画，此与初唐太宗提倡汉代《列女传》有关，该题材分布于都城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都城的政治意义所决定的。后者则为树下老人（高士）屏风画，集中见于太原晋源区金胜村唐墓。此为唐代墓葬屏风画中两大类别之分野，但在长安地区唐墓间或也能见到树下老人屏风画。此为学界之共识。我们认为树下老人（高士）屏风画在太原地区唐墓的出现跟这批墓主的种族文化及其在初唐政治中的作用和态度有关。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唐墓屏风画分野的局面。

李唐仗群才登皇极，经纶天下。李唐取代杨隋依靠的是出身各异的人，“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对唐太祖、唐太宗起事支持的粟特人亦不在少数。如，安胡安元寿曾独立帐内侍卫唐太宗，足见唐太宗对安元寿的倚重与信任。中古中国的统治者重视对胡人的利用，而胡人也很注意对统治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政权嬗代交替之际，他们多能凭借敏锐的嗅觉而给新生的政治力量支持，包括财力、武力等方面。到了武周时期仍是如此，著名的洛阳建天枢事件便是一典型案例。

并州地区（太原）历来本身就是胡人聚居之地^[82]。洛阳发现的隋《翟突婆墓志》说其父是大萨保，并径称自己是并州太原人^[83]，可见这些人已把晋阳当老家了。

隋唐之际，太原有一批粟特裔辅佐李渊起事，成为太原元从。

如，龙润墓志称其“并州晋阳人也。……君属隋德道消，嘉遁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贞观廿年，春秋廖廓，已八十有余，驾幸晋阳，亲问耆老，诏板授辽州刺史。于时须鬓皓白，若园绮之重生；服饰朱紫，似齐人之独出。盛修第宇，口侁南阳樊重之家；子孙就养，仿像西晋安仁之孝。妍歌妙舞之乐，常在闻见之中；肥醲甘膳之饌，不离左右之侧。颜色怡怡，尝无疾苦，百年上寿，匠欲及之，有始必终，夫复何患。永徽四年九月十日，薨於安仁坊之第，春秋九十有三。潜灵宾室，待吉邀时，永徽六年二月廿日附身附椁，必诚必信，送终礼备，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村东义井村北，刊石志事，置诸泉户。”^[84]太原是他最初的寓居地，故夫妻合葬于此。

龙润儿子骑都尉龙义墓志文便自称“晋阳人也……属大君豹变，早预□龙。□□隆恩，授公骑都尉。方当陪祠日观，聆万岁之声；扈从游汾，泳秋风之□。……以大唐龙朔三年岁次癸亥二月乙

《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页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8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博物馆《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页29。

^[81] 张佳《西安长安区发现吐谷浑公主与丈夫合葬墓出土青铜制药器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5年12月17日。

^[82] 渠传福、周健《晋阳与“并州胡”》，《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页73-77。

^[83]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四八四。

^[84] 《全唐文补遗》第5辑，页111。

酉朔十二日景申，合葬于晋阳城北□（廿）里堀山之原，礼也”^[85]。

唐介州（今汾阳）骑都尉曹遵及其子曹怡便是如此。曹怡墓志称，曹怡“秉灵海岳，感气星辰，家着孝慈，国彰忠烈。起家元从，陪翊义旗；后殿前锋，殊功必致，于是授公（曹怡）骑都尉，用旌厥善”^[86]。

上述龙润父子、曹遵父子都是追随李渊起事的太原元从。

太原金胜村第五号墓所出砖志文所言：“启运之期，投节从戎，（指）麾万里”，便道尽了墓主跟随李渊起事的显赫经历。换言之，墓主应为武职，是并州起兵的元老，且为李唐的“太原元从”。

那么墓主人有可能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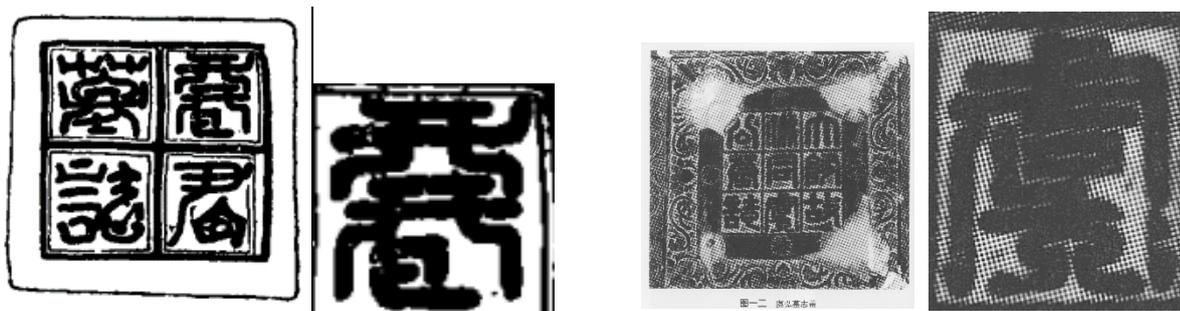


图 10 太原金胜村第五号唐墓墓志盖铭文摹本及 图 11 太原隋虞弘墓墓志盖拓片及“虞”字细部细部

太原金胜村第五号唐墓墓志盖铭文摹本（图 10）给我们提示了墓主姓氏的重要线索，但是因是白粉书就，此字厘定不易，难以找到与之完全对应者。比较太原隋虞弘墓志盖之“虞”（图 11），有可能前者便是此字。颇疑二者不能完全吻合，很可能是墓志书写者汉文水平较低或是描摹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图 12 太原金胜村第五号唐墓所出陶灯

前面已经论及，太原金胜村这批唐墓墓主为粟特裔。太原金胜村第五号唐墓所出银币既非口含，亦非手握，不清是否是墓主夫人佩戴之饰物。该银币背部中间饰有祆教火坛及祭司图像，则墓主或以此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未可知。若此，则此可成为判断该墓主是信奉祆教的粟特裔的一个证据^[87]。此外，该墓还出土有一件东罗马高足杯式陶灯（图 12），似也在寓示着墓主的种族。

虞弘墓志云：“春秋五十九，薨于并（州）第。以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十八日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88]明万历《太原府志》记载：唐叔虞墓在县西南十五里^[89]。即，今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西^[90]。虞弘墓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村南。综上所述可知，开皇十二年虞弘所葬墓穴便是今之虞弘墓。即信奉祆教的虞弘生活于并州，死后葬于太原市晋源区一带。如果该推论成立，那么这批太原金胜村唐墓墓主便很可能与虞弘所辖种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前已述及，除太原焦化厂唐墓外，太原金胜村唐墓墓室北部皆为东西向棺床。同时，墓室顶部

[85] 《大唐故骑都尉龙君（义）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 6 辑，页 293。案，“晋阳城北□（廿）里堀山之原”之“廿”，乃据龙义父亲龙润墓志文“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村东义井村北”补。

[86] 王仲璋主编《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 年，页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博物馆《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11 期，页 29；王俊《唐曹怡墓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4 年第 11 期，页 60-65，73；张庆捷《唐代〈曹怡墓志〉有关入华胡人的几个问题》，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页 644-652。

[87] 案，若此，前述固原南塬 M15 墓主应也信仰祆教。

[8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页 91。

[89] 《明》《太原府志》卷二四，杨淮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 399。

[90] 张庆捷《隋虞弘墓志考释》，载《太原隋虞弘墓》，页 225。

装饰也相应发生变化，绘制莲花和幔帐流苏或挽结花幔。这种墓葬装饰转变恰恰跟这批墓葬墓主粟特裔的身份紧密相契的。在南北朝隋时，中古中国的粟特裔贵族在墓室中东西横置石质的围屏石榻（石重床）或石堂，其上雕绘“墓主夫妇宴乐+两侧驼马/犍车出行”的丧葬图像，其中墓主夫妇多对坐于衬以联屏的坐榻上，其头顶绘有华盖或帷帐。

时代风尚、政治氛围变了，作为使用者的他们最能切身感受到，并及时地转换表现形式。在唐代禁止石椁等石葬具的新时期，他们能及时地将原来围屏石榻上内容的配置分解到墓葬中去。墓室北部东西向的棺床，可视作此前中古中国粟特裔贵族墓室东西横置的围屏石榻的石床。而墓室顶部的幔帐流苏，则为此前中古中国粟特裔贵族围屏石榻背屏中对坐的墓主夫妇头顶之帷帐的转换。换言之，正是太原金胜村唐墓墓主粟特裔的身份使得这批唐墓墓室壁画建制能及时地反映墓主人坐在衬以联屏的坐榻上、其上有华盖的壁画建制的变化。

通过统计长安地区使用高士屏风画的墓主身份^[91]，可知，在树下人物主题被替换之前（即山水花鸟出现之前），除了应和初唐统治者的汉魏情结而追求汉晋之风外，使用高士屏风画的多为大臣，如苏思勳^[92]等；而使用仕女屏风画的则是皇亲贵戚。此缘于高士屏风画表示忠孝以及对政权的忠诚有关；而仕女屏风画则源自李唐统治者对汉代《列女传》的倡导^[93]，意在警醒皇室外戚不干政事，由此也成为皇室贵戚自省及身份的政治标签。

初唐以后，归隐和对李唐政权的忠诚是粟特胡的两个共同主题。如前述龙润便是如此，康文通亦应即此中人物。根据墓志文知，康文通祖和为隋上柱国，父鸾为唐朝散大夫。康文通出生豪门望族，却身为处士，其三子玄植也只是庆州乐蟠主簿而已。其墓志文称：“修身践言，非礼不动，温厚谦让，唯义而行。于是，晦迹丘园，留心坟籍。以为于陵子仲辞禄而灌园，汉阴丈人忘机而抱瓮。瓮白无玷，庶几三怀之言；黄金满赢，不如一经之业。讲习诗礼，敦劝子孙。松乔之术未成，灵化之期俄远。”^[94]这是隋唐禅代之际，众多入唐粟特胡功成身退的一例而已。如果把它置于整个时代氛围中来理解，我们甚而还能依稀感受到康文通父祖辈在隋唐禅代之际所起的作用。

到了玄宗时期，安金藏的故事传颂的还是他当初（武周时）对睿宗皇帝的忠心。

太原金胜村墓主为初唐追随李渊起事的粟特裔。所以，其墓葬壁画绘制树下老人屏风画，展示忠义理智信——忠孝，实际上是再次表达忠于李唐政府的政治立场，故跟长安地区的墓葬屏风画内容不同。宁夏固原梁元珍墓绘有树下老人屏风画^[95]，墓主崇尚魏晋玄学，曾是一位隐士，其墓葬壁画采用高士图恰是他自况之举。可为辅证。同在太原晋源区的温神智墓，其墓室屏风画中的树下老人内容便与金胜村者不同^[96]。这似乎也可以说明金胜村唐墓墓主种族及其政治经历的特殊性。

从墓葬建制来看，对于建立功勋的粟特裔，李唐政府采取褒奖的方式。如，以史索岩夫妇为代表的一批粟特人与隋末唐初的政治紧密相连^[97]，于隋唐易代之时，不仅仅能归附李唐，初唐时更是引进蕃马，改良马种，为“初唐盛唐时期辉煌的马政奠定了基础”^[98]。因此，即便是官居四品，但也得以准允使用唯有三品以上官员方可随葬的木明器。随葬木明器便是李唐王室对史索岩的褒奖。

太原金胜村这批唐墓墓主曾追随李渊起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批墓葬的墓制（规模）、与随葬品和壁画的自相矛盾之处，缘于初唐政府的特别恩赐。这种恩赐在粟特裔处士康文通墓葬^[99]中同样

[91] 安婷《唐代屏风画墓分期与相关问题》，北京大学本科学位论文，2012年6月，页23表1。

[92] 陕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勳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页30-36。

[93] 沈睿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年，页217-220。

[94] 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康文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页17-30、61。

[95] 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第6期，页1-9；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页117-120。

[96] 常一民、裴静蓉《太原市晋源镇果树场唐温神智墓》，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09-213。

[97] 李锦绣《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页49-60；李锦绣《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亚欧学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页261-276。

[98] 李锦绣《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亚欧学刊》第10辑，页261-276。

[99] 案，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康文通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前后弧方形双室砖墓，随葬三彩文、武官俑，

得以体现。抑或这是初唐政府在这批追随起事的胡裔的丧葬中所采取的优待的政治行为？

如上所述，在南北朝的各个时期，在多个政治中心区域都发现有无棺葬现象。南北朝时期采用无棺葬的墓主大部分应是粟特裔，但不排除其他民族受到这种葬俗影响而采用无棺葬的可能性，如宋绍祖墓和安阳固岸 M57。同时，粟特裔中肯定也存在受中土葬俗影响而使用棺木的情况^[100]。固原南塬隋唐时期墓葬 M21、M25、M29、M48 的六具人骨架具有西方人种特征，其中前两座墓葬为无棺葬，后两座墓葬使用木棺^[101]，可能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使用木棺的情况也见于盐池窰子梁墓地 M2 以及固原史氏家族墓葬。显然，无棺葬在南北朝的分布范围要远大于初唐所见。初唐时期，无棺葬的葬俗集中见于太原地区，很可能便跟该时期太原胡裔追随李唐的突出表现有关。而固原地区出现无棺葬的现象，则除了隋唐时期该地区处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枢纽地位以外，恐还跟该地区马政在朝政中的重要地位有关^[102]。马政具体是由粟特胡掌握的，如此应也吸引大批粟特胡至此盘桓。固原南郊史氏家族墓地中的史射勿子史道洛墓发现有殉狗龕，出土的动物尚有鸟、鼠、兔、马鹿、黄牛、马、绵羊等，《报告》认为其中鼠可能是后来自行潜入的，其他各种动物大概都与当时人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103]。不过，这应是北方游牧民源于丧葬宴的殉牲习俗有关^[104]，此类现象表明掌管唐朝马政的史家仍然保留着内亚的丧葬习俗。

固原南塬 M4、M40 皆殉狗，M8 墓室发现牛肢骨、M16 墓室发现马头骨、M30 墓室发现羊骨架、M39 墓室发现一枚猪犬齿^[105]。这些墓葬表现出跟上述掌管唐朝马政的史家相同的葬俗，表明这些墓主种族文化的内亚属性，亦即他们跟掌管马政的史家的种族相同。显然地，它们的墓葬等级要比固原史氏家族墓葬低得多，这应可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要比固原史氏家族低得多，或许便是马政中的下层人员？

小 结

太原金胜村唐墓为信仰祆教的粟特胡家族墓地，墓主人的品位多在从五品以下。隋唐嬗代之际，他们追随李渊起事，建立功勋。他们可能为虞姓粟特胡，结合隋虞弘墓的发掘，可进一步勾勒出虞姓粟特胡在隋唐嬗代之际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他们选择树下老人（高士）屏风画便是这种立场和行为的的结果，表示对新生的唐政府的忠诚和功成身退、无意政治（归隐）之意。

从墓志来看，入唐粟特裔确实存在天葬的行为。就目前情况而言，隋、初唐粟特裔祆教徒的墓葬表现有如下四种形式：第一种，如，盐池窰子梁墓地以及固原九龙山 M33，此为传统的方式。第二种，如固原史氏家族墓地，对所辖王朝的国家认同，但亦不悖其种族文化。第三种，如，太原金胜村唐墓的形式，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第四种，如，曹怡墓。天葬后，仍营建虚冢，展示其享受的政府待遇。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初唐，集中于武周时期。

粟特裔无棺葬的葬俗影响了该地区被胡化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在埋葬、迁葬以及合葬仪中，他们也采用了相同的无棺葬方式。同时，这种习俗也经由移民的迁徙而出现在其他地区。如，河北

以及表示出行仪仗的三彩马、驼俑，这远不是康文通处士的身份所能使用的。康文通得以使用这个葬制很可能跟他祖父辈追随李唐起事建立功勋有关，一如太原金胜村唐墓墓主一样。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康文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页17-30、61。

^[100] 刘振东《论南北朝时期无棺葬》，《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5期，页84-94。

^[10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塬汉唐墓地》，页67-68、71-73、75-76、114-115。

^[102] 案，在陕西省华县发现一座土洞墓，墓口有封门砖，墓室横置一须弥座石棺床，床上置一骨架，未发现木棺痕迹及墓志。该墓初步判断为初唐时期。2016年7月22日，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告知，于此谨致谢忱。

^[103] 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页28、173。

^[104] 罗丰《北方青铜器墓中的殉牲习俗》，《第三阶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早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宁夏：银川，2016年9月22-25日，页101-135。

^[105] 详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塬汉唐墓地》，页32、100、41、59、78、98。

南和郭祥墓^[106]、前述河北鸡泽县北关发现的郭氏家族墓以及山西长治调露元年(679)王深墓^[107]等，此不赘举。

本文原载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页7-32。

^[106] 辛明伟、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年第6期，页20-27，64。

^[10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页53-57。案，王深为并州太原人，随宦播迁，其墓葬同样采用无棺葬的方式。